

“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探析

● 张学兵

[摘要] “改革从1975年开始”是邓小平提出的。它的存在价值，不在于其相比“改革从1978年开始”论哪个更为准确，而在于其背后透露出的诸如改革的主政角色、改革的初始路径以及改革的历史承续等方面深刻、复杂的历史信息和历史底蕴。

[关键词] “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初始路径；历史承续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2-0008-04

DOI:10.14019/j.cnki.cn31-1856/k.2018.02.009

一、“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的由来及学界使用情况

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这在党政文献、学术论著乃至人们的日常言谈中，已近乎不言而喻、不证自明。被称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自然也认同这一说法，不过，在某些时候的谈话中，他也曾提出过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改革是从1975年开始的。

就公开的文献来看，邓小平谈及改革从1975年开始，计有两次。一次在1984年10月，在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他说：“其实，拨乱反正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1]另一次在1987年10月，在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会谈时，他再次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2]两次谈话的具体表述虽略有不同，但基本所指却相当一致，我们姑且称之为“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

“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提出后，颇受中共党史研究者们注意，并不时被引述。不过，仔细体察便可发现，研究者们对“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的引述，与邓小平本人的谈论存在着微妙的语境差异。研究者们多在评价1975年整顿的时候才引用“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试图借1978年后的改革来强调、突出1975年整顿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因此，他们鲜有在论述1978年之后的改革的时候提及“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邓小平本人的谈论则迥异其趣，他是在评说1978年之后的改革的时候，将其

源头追溯至1975年的整顿，认为改革在那个时候实际就开始了，只不过一度被中断。显然，研究者们窄化了邓小平“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的使用范围。

这里，我们试图回到邓小平的原初语境，从改革的角度来认知“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就此而言，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并不在于从实证意义考察“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与“改革从1978年开始”论哪个更为准确、更契合真实的历史，而在于揭示“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包含着的、或折射出的一些复杂、微妙、独特的历史信息，如改革的主政角色、改革的初始路径、改革的历史承续。这样的探讨，或能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演进过程的复杂性，把握历史转折背后的连续性。

二、“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与改革的主政角色

如前所引，邓小平在与外宾谈到改革从1975年开始的观点的时候，还连带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强调“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这表明，改革从1975年开始的说法有着鲜明的邓小平个人印记。

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领导者，邓小平的经历、事业跨越不同历史时期，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他的角色作用和领导位次是不一样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邓小平个人事业的最高峰，自然是在改革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他是中国的实际领导者和主政者。

往前回溯，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也是领导层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五六十年代党内的核心决策，直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去职。这个阶段，邓小平虽然是核心领导层的成员，但从具体施政层面上来

说, 只是一些具体领域、部门的中央分管领导。

及至“文化大革命”后期, 邓小平重新获得毛泽东的信任, 逐步恢复在党政军的各项任职。此时, 毛泽东、周恩来均已抱病, 在毛、周等人的支持下, 邓小平以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身份主持1975年的整顿工作。这实际是主持了全国、全局的工作, 也使邓小平在毛泽东时代达到个人事业的顶峰, 尽管不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颇有异趣的是,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反而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在1975年整顿中的主张和作为, 从而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扩大、增加了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奠定了他再次复职并主政的民意基础。

因此, 就邓小平的从政经历和事业轨迹来说, 1975年确实有着不同凡响的关系和意义。1975、1978, 对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来说, 均是极具标志意义的年份。1975年整顿的推展, 1978年改革的启动, 从宏观历史来看, 可以被认定为内涵有异、性质不同的两件事; 但从当事人的经历来看, 这两件事实际上都是同一人在主导, 而且时隔仅仅两三年。因此, 邓小平将这两个年份连接起来, 认为1978年后的改革实际上从1975年就开始了, 也在情理之中。

把1975年视作邓小平人生、事业历程的一个新起点, 这在研究者中已有相当程度的认知。比如,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编写出版的《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集》《邓小平年谱》等著作, 均是1975年作为划分人生和事业历程的新起点、新节点来处理的。

三、“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与改革的初始路径

邓小平在谈到“改革从1975年开始”的时候, 同时道出了这句话的内涵, 即“强调把经济搞上去, 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对此, 今天的人们不免会生出疑惑: 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的时候强调搞经济、竭力恢复生产秩序, 这些内容为什么会被称作改革、甚至改革之始呢? 这个问题, 或许应结合通常被称作改革之始的1978年来分析比照, 亦即考察中国改革的初始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人们每每以“市场取向”来概括中国改革的初始路径。比如, 江泽民说, 农村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走的。^[3]万里说: “我国的改革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市场取向的。”^[4]从长时段的历史演进来看, 这样的说法自然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但是, 假如回到具体的历史时点, 考察具体的历史情境, 恐怕就很难用“市场取向”来简单概括了。改革之初, 在微观经济领域强调“放权让利”, 如承认农户承包经营权、扩大企业经营自主

权、发展个体经济。这些在当时被称作“搞活”的举措, 确实是明显地引入了市场机制。不过, 这些因素本身与具有一整套体制机制安排和权利义务关系的市场经济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它们能否向市场经济演变, 还要取决于后来宏观经济体制的选择。

那么, 从宏观经济领域和整个经济体制的角度看, 改革的初始路径是什么呢? 这就要看当时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了。恰恰在这一点上, 1975、1978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 亦即无论1975年还是1978年, 无论整顿还是改革, 其所处的经济体制安排和经济运作实况基本一致。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 虽然号称搞计划经济, 但从实际运行来看, 宏观经济领域的计划性一直比较薄弱, 根本实现不了执政者孜孜以求的“有计划、按比例”, 其真实图景恰如经济学家马洪的概括, 就是“名为有计划, 实则是半计划和无计划”^[5]。这种乱象的出现, 一方面是无法制约的长官意志和不曾中辍的政治运动的干扰; 另一方面也是一次次的资源配置权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收放、集散, 造成了“收收放放地来回折腾”^[6]。

当然, 1975年和1978年两个年头比例失调、经济失序、计划缺失的具体成因, 也不尽相同。1975年的状况, 借用1978年2月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话说就是, 从1974年到1976年, 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 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7]1978年的状况, 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坏之外, 更直接的肇因则是1976年后两年间“大引进”“大干快上”, 即被后来批评的所谓“洋跃进”。

因此, 无论1975年还是1978年, 所要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当然是整顿国民经济秩序, 恢复计划的有效性。就1975年而言, 用邓小平的话说, 就是首先恢复生产秩序。就1978年而言, 一开始的政策选项, 更多地也是要从“折腾”“大轰大嗡”走向“按经济规律办事”, “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8]当时,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是调整重大比例关系, 力争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

可以说, 1975、1978这两个年头, 都谈不上什么引进市场因素和调节的问题, 就改革的初始路径而言, 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 毋宁说都是“计划取向”的, 都是要结束国民经济的失序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不仅有其合理性, 而且还能从中窥见一些独特的历史信息。

四、“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与改革的历史承续

邓小平在谈到1975年整顿的时候, 用了“那时

的改革”一词。这一用词正可提示我们去了解一下“改革”这个概念的使用情况。

时下，人们往往习焉不察地以为，改革不仅是1978年之后的事情，甚至还是1978年之后的概念。殊不知，就概念而言，1978年以前，改革一词也是经常使用的。比如，1950年6月，毛泽东曾讲到，“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9]1957年3月，毛泽东说过：“中国的改革与建设靠我们来领导。”^[10]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政策文件，也不乏冠以改革之名的。显然，这时所说的改革，实际是一种泛称，指的是改进、变革之意。

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还承续着这一传统，在泛称意义上使用改革概念。比如，1978年9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明确指出，“过去20多年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11]。1979年7月，胡耀邦在驻外使节会议上说到，“过去30年，我们不可能有很大的精力搞经济。开始几年不可能摸经济，主要是改革”^[12]。

进一步说，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涉及到改革与历史新时期的关系问题。今天人们普遍认为，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从而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然而，必须指出，这一叙事的形成和接受，更多地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在改革之初以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的语境中，关于改革与新时期关系的叙事，却截然相反。

当时，人们把1976年视作新的历史时期的发轫。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指出，粉碎“四人帮”，“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3]。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指出，粉碎“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4]。以1976年为新时期开端的说法，通行十数年，直至90年代中期之后才逐步淡出，不再占据主流。

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早期，决策者和理论界并不像今天这样，认为随着改革的启动，历史进入新的时期；而恰恰相反，认为随着党和国家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改革步入新的阶段。在当时看来，70年代末的改革不过是50年代以来多次改革中的又一次、新一轮改革而已。考察历史文献，大致有两种说法。

从比较大的角度来说，这是第三次改革。按此说法，前两次较大的改革，分别发生在1958年和1970年。比如1979年12月，国务院财经委体制改革小组形成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

意见》，回顾了5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经历的几次较大变革，指出：“1958年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改革的中心是扩大地方的权限”；1970年前后，“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又采取陆续下放给地方一些权限的办法进行改革”。^[15]

从比较细的角度来说，这是第五次改革。1984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书，便持此看法，认为前四次分别是“一五”末期、“大跃进”时期、调整时期、十年动乱时期。该书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开始酝酿一场新的经济体制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6]

当然，随着实践推展，1978年后这一轮改革导向了深刻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带来了中国“经济奇迹”，造成了世界性影响，以致有国外媒体评论称“21世纪始于1978”^[17]。改革的概念也逐步从泛称嬗变为专指，主要被用来表示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之意，甚至被用到了历史分期中作为标志性的名词，并与“新时期”“1978年”等字眼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或许可以这样说，邓小平谈到改革始于1975年时，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泛称的意义上使用改革的概念，“那时的改革”一词就是明证。而这种概念使用方式的背后，更透露出当时决策者对1978年改革的理解，即它只不过是对历次改革探索的接续。因此，“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的存在，或许能够提醒人们，改革是一个不断酝酿的过程，太过突出1978年的历史转折意义，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割裂实然的历史，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

历史固然有转折，但转折背后的延续性也很重要。其实，改革年代的变革和发展，单以1978年为界，其因果链条和演进机制往往难以解释清楚，比如乡镇企业的发展、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权力格局等。事实上，1978年逐步被视作历史的“分水岭”，也是随着后来的体制机制变革、经济社会转型而被逐渐凸显和放大的，某种意义上也就像顾颉刚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所揭示的那样，是“层累地造成”的。科斯的一段话值得品味：中国市场转型的伟大成就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心策划的结果，“相反，是市场经济转型本身提升了会议的历史意义，使其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转折点”。^[18]

参考文献

- [1]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1. 255.
- [3] 江泽民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11.
- [4] 万里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24.

- [5] 马洪. 谈谈经济方面的几个理论问题[J]. 计划经济研究, 1979(2).
- [6] 姚依林. 关于制定长期计划的一些初步认识[J]. 计划经济研究, 1980(13).
- [7] 华国锋. 团结起来, 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978年2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N]. 人民日报, 1978-3-7.
- [8] 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125.
- [9] 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80.
- [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75.
- [11] 李先念文选(1935-1988)[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331.

- [12] 房维中. 在风浪中前进: 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Z]. 1979. 156.
- [13] 华国锋.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N]. 人民日报, 1977-08-23.
- [14] 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819.
- [15] 房维中. 在风浪中前进: 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Z]. 1979. 232-233.
- [16] 周太和.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159. 168.
- [17] 转引自环球时报, 2008-10-31.
- [18] [英] 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 变革中国: 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63.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研究员

■ 责任编辑: 晏蔚青

第二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上海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中共一大会址重要讲话精神为依据,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深入发掘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的光荣历史、伟大精神、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 更好地传承信仰之光和理想之火, 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 让建党精神持续发扬光大, 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营造迎接建党100周年大庆的浓厚学术氛围,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联合开展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学术研讨会征文活动, 并于6月中旬召开专题研讨会。具体要求如下:

一. 征文要求

1.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主题鲜明, 观点正确, 有深度, 有价值。
2. 来稿应为未发表的原创文稿, 字数一般不超过8000字。标题用小二号黑体, 正文用四号宋体, 正文前200字内的内容提要, 关键词3至5个。引文和史料注明出处(统一为页下注, 每页重新编号), 注释规范。文末附上作者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联系方式及通信地址等。
3. 应征论文截稿日期为2018年5月底。

二. 选题参考

可根据以下参考选题或自定选题撰写论文:

1. 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中共一大会址重要讲话精神
2. 上海的红色基因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3.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彰显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4. “渔阳里”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5.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上海的历史发展
6. 上海城市精神、城市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7. 《新青年》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8.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思想轨迹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9.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研究
10.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发祥地
11. 初心与使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的传承
12. 上海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相关人物研究
13. 上海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相关专题研究
14. 中共中央在上海
15. 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中共早期组织研究
16. 海派文化与红色基因

三. 征文评审

本次活动由研讨会主办方成立专家评审组对应征论文进行评审, 择优录用。入选论文的作者, 即为以文入会的代表(多人合作的论文邀请第一作者参会)。

四. 投稿方式

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18757693028@163.com
15901800835@163.com
联系人:
陶雪松, 电话 18757693028
谢小昌, 电话 15901800835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